

大學應該採取政治立場嗎？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從前從前，有個故事說美國大學是一個「僅為了偉大的教學及研究目的建立的社群」。這是一個「中立」的地方，但並非因為「缺乏勇氣，也不是出於冷漠或麻木不仁」，而是因為「尊重研究自由及重視多元觀點」。它「獨立於政治追求和壓力」之外，從而持續「挑戰著社會價值觀、政策、制度和實踐」。因此，大學是一個在偏見、不平等和自私的海洋中無私學習的孤島。

故事很勵志，可惜現實並非如此。已經 2022 年了，這樣的烏托邦並不存在，但同樣在 1967 年也不存在：上述的文本摘要自 1967 年芝加哥大學由 7 位學者撰寫的 Kalven 報告(Kalven Report)，報告指出這樣理想化的大學從來不存在。當我們越仔細研究美國大學歷史，會發現大學與其他機構一樣，根植於社會，並受到其他塑造社會的相同力量的影響。在 1967 年，美國白人被授予學位的高等教育機構錄取的可能性，是美國黑人的兩倍多，而男性被錄取的機率是女性的兩倍。那麼，芝加哥大學當時代表的觀點有多麼多樣化呢？以及當時該大學——以及任何其他大學——有多麼獨立於其他社會和政治力量呢？

毫無疑問地，在決定要包含和排除哪些聲音時，「大學」顯然採取了一種「集體行動」——不是透過發表聲明，而是透過做出有實際影響力的政策選擇。正如 Kalven 報告所顯示，這並非簡單地助長「對社會現況的不滿」，而是在許多方面選擇接受和加強這些現況。它的「重視多元觀點」是有局限性的：這些局限性非常符合當時的主流觀點。正如同現今許多社會問題都存在爭議一樣（例如種族主義、氣候暖化、民主未來，或對疫情的觀點），大學幾乎沒有哪一天是不需要採取立場的。

當然，當大學過於關注社會和政治事務時，有可能偏離其核心目標。然而，當不採取行動實際上也成為非常明顯的「立場」時，這樣的不作為也可能被隱藏在「中立」的幌子後面。與其將這場辯論鎖定在中立或表態與否，不如問：大學應該在什麼情況下，對那些理性的

人可能會採取的立場表達不同意見，又應該以何種方式表達這些立場？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模糊的。當麻州波士頓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Boston）、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對種族主義及川普的仇外政策表態時，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基本上是沉默的：似乎「中立」是大學的一個承諾。已故的高等教育界領導者 William Bowen 即明確「反對大學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外部問題上採取立場或行動」。但儘管如此，他也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大學作為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在針對校務以外的議題上發言也是適當、甚至是必要的」，尤其是「涉及與大學教育目標直接相關的問題」。

這就是問題棘手的地方：哪些是與大學「教育目標相關」的問題？此界線是相當模糊的。且不幸的是，在某些情況下，大學行動的規准不是對教育使命的承諾，而是自身利益：為什麼對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表態而非投票權？因為禁止平權法案不僅會顛覆許多招生做法，還會為學校帶來法律風險。為什麼對禁止國際學生表態，而不是更廣泛地對禁止來自大多數人口為非白人的許多國家的移民發聲？因為許多學校嚴重依賴這些國際學生的學費收入。

所以，似乎最後看似令人不滿的結論是：雖然大學通常不在社會和政治問題上表態，但有時它還是會發聲；雖然採取立場的必要條件與大學的使命相關，但該使命的性質和理解因機構和學校領導者而異。如果有人認為高等教育的目的不僅限於「教學和研究」，還包括為「公民參與公民生活」做準備，那麼大學——身為有巨大特權及影響力的機構——必須考慮如何及何時採取行動。最後，儘管 Bowen 認為，在外部問題上，大學表示中立有助於「保護大學的內部學術自由免受外部干擾」，但這或許適用於 1978 年當他寫下這些話時。到了 2022 年，這艘船已經出航，外界的干擾正從四面八方湧入大學。激進人士以各種直接和咄咄逼人的方式，想要控制從課程到研究、以及到教授升等等一系列政策。大學可能想置身於政治之外，但政治正在向大學湧來。每個學校領導者及每個大學機構，都需要重新思考「中立」——在這個兩極分化嚴重的時代——是否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資料提供時間：2022 年 4 月 4 日

撰稿人 / 譯稿人：Brian Rosenberg / Pei-Jung Li

資料來源：2022 年 3 月 31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Universities Take Political Stands?

撰稿人/譯稿人：Brian Rosenberg / Pei-Jung Li

資料來源：2022 年 3 月 31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